

方面也带来了社会腐败、环境污染等一系列社会和自然生态问题。发展主义打着人本主义的旗号,引导人们以无限贪求物质财富的方式追求人生意义,扭曲了人性,而以经济理性支配政治、文化、道德等所有领域的发展观则使我们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中国唯有摒弃片面的发展主义,建设生态文明,中华民族才可能实现真正的伟大复兴。

郁庆治教授认为,2013年迅速升温的雾霾议题及其应对已经演变为一种鲜活生动的环境政治。雾霾政治不同于自上而下的传统政治,雾霾之困的有效破解同时取决于党和政府、企业与公民个体三个层面上的主体行动。他指出,虽然雾霾已然成为目前中国最具大众动员潜能的民生政治议题,但无论政府还是大众的政治回应都显然还未达到一种适当的水平。尽管如此,随着国家性应对雾霾成为即将开始的新一轮改革与发展中的硬任务,我们有理由期待雾霾政治成为推动环境政治与民主政治进步的重要动力。

林德宏教授指出,治理雾霾不能修修补补,就事论事,必须在观念上寻找深层原因。严重雾霾的直接导因是不合理的生活方式,而物本主义是雾霾灾害的思想根源。工业社会的生活方式形成了物本主义价值观,彻底治理雾霾必须在观念上超越物本主义。

唐代兴教授认为,雾霾是一种极端环境灾害形式,造成极端环境灾害发生的直接动力是不顾一切发展经济的社会运动,其最终的伦理根源是人与自然的分离、发展对生存的傲慢、物化主义对生境幸福的蹂躏。对雾霾的自救之道是以生境伦理为导向,重建生境制度,重建未来引导现在的理性精神和生存才是硬道理的社会存在原则。

郭辉副教授指出,雾霾是种病,席卷中国的雾霾表明中国病了。雾霾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污染物排放累积的结果。健康是最普遍的福祉,是人类个体生活、社会发展和所有生命生存繁衍的前提和基础。大自然是人肌肤之外的身体,人类的健康与自然的健康具有一体性,人类以及所有生物的生存发展都离不开健康的自然环境。

发展主义与片面发展的代价

卢风

(清华大学哲学系)

自1978年改革开放直至今日的30多年,是中国急速现代化的一个时期。在这30多年中,我们取得了新型工业化、工业化与信息化并进的巨大成就。如今,高速公路、高速铁路越来越多,有汽车的家庭越来越多,几乎家家有电视、电脑,人人有手机,我国网民数量已达5.91亿。那么,今日中国人的生活比30多年前的生活幸福多了吗?未必!财富总量快速增长了,但贫富差距也迅速拉大了。中国共产党不再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了,但穷人和富人、百姓与官员之间的矛盾变得十分尖锐。各地工厂越来越多、城市越

① 基金项目: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成果(11ZX001)

来越大,但自然环境被严重污染了,各地的生态健康被严重破坏了。食品、衣服、住房是幸福生活的必要条件,清洁水、清洁空气,或概括地说,清洁环境,也是幸福生活的必要条件。失去了清洁环境也就失去了幸福生活的必要条件。2013年初以来全国各地多日出现雾霾天气,多数人在这样的天气里都难有好心情。我们未必比过去的人们更幸福。

改革开放以来,最深入人心的观念便是发展的观念。发展主义(developmentalism)是主流意识形态中深得各阶层人们衷心拥护的观念。发展主义是源自西方现代性的一种社会哲学,其思想要点包括:人类社会是不断进化或进步的;发展就是进步;社会发展的动力源自人们对物质财富增长或物质生活条件改善的追求,或源自物质生产力的不断进步;科技创新是追求物质财富增长和物质生活条件改善的根本途径,或是提高物质生产力水平的根本途径;发展的根本标志就是物质财富的增长和科技进步。在冷战期间,存在两种发展主义的观点,一种是社会主义的发展主义,一种是资本主义的发展主义。冷战结束以后,资本主义的发展主义明显占了上风。如今的发展主义蕴含经济主义。而经济主义认为,人的一切活动归根结底是经济活动,经济(基础)决定政治、道德和文化,经济增长可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科技进步可保障经济的无限增长(虽然有周期性的波动)。坚信发展主义的人们有时承认,不断追求发展会导致各种社会问题(如贫富分化、阶级冲突等)和环境污染,但他们坚信,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绝不是停止发展,而是更加坚定地谋求发展,各种问题(包括环境污染和气候变化)都能够且只能够在进一步的发展中得以解决。

我国近30多年的现代化建设成就源自发展主义的深入人心,我国的社会腐败、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也源自发展主义的深入人心。

我国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改革过程深受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影响(经历了较为曲折的思想斗争和路线斗争)。西方主流经济学预设人是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人所追求的一切价值都可以归结为经济价值,都可以用货币衡量,甚至认为衡量人间事务的好坏标准就是效率标准,即如果你办一件事的方法是高效率的,那就是好的,反之,就是坏的(隐含对手段和方法的极端重视)。西方主流经济学自命为一种科学,声称它以上的预设都是对事实的描述,而不包含价值判断。其实,恰是这种对所谓事实的描述包含着很强的价值导向——经济主义的价值导向。根据西方主流经济学和经济主义对人的所谓科学描述,人们很容易得出结论:人的本性就是追求物质财富的不断增长,个人幸福依赖于个人收入的增长,社会改善依赖于整个社会经济的不断增长,收入下降的个人是不幸的(不管她/他已有多少财富),经济衰退的国家是不幸的(不管其人均GDP已达多少)。其实,这种对人性的描述,并不源自对人的本质的直观,而源自对大多数人价值追求的统计性分析。我们可以承认,多数人都是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都是追求个人收入的不断增长,但不能说人人都是这样(像颜回和梭罗那样的人根本就不在乎收入是否增长),因此不能说这就是人的本性。

西方主流经济学混淆了人的由生物性决定的特征和由文化所塑造的特征。必须吃喝

才能活着,必须性交才能繁衍后代等特征,是由人的生物性决定的特征,超越生存需要而追求物质财富增长却并不是由人的生物性决定的特征,而是由文化所塑造的特征。人的由生物性决定的物质需要是较容易得到满足的,例如,每个人只能吃那么多、穿那么多,但人的物质需要一旦被文化所放大,就可能趋于无限而转化为不可遏止的贪欲。

传统文化总是压抑人的物质需要,而把人的文化需要引导于精神方面。唯独现代工业文明打着人道主义或人本主义的旗号,引导人们以无限贪求物质财富的方式追求人生意义,即把人的文化需要引导于物质方面。

西方主流经济学根据对大量人口价值追求的统计性概括而得出的关于人性的判断与中国古代儒家关于人性的判断迥异。由前者必然走向经济(或资本)决定一切的文化,而由后者必然走向道德主义文化。中国儒家深谙人性之负面阴影(人心惟危)。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但孟子不认为所有人都与禽兽没有多大差别,进而说,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人与禽兽的根本区别在于人有道德,而禽兽没有道德。但许多人不重视道德修养,故与禽兽的差别微乎其微,而君子重视道德修养,于是超乎禽兽之上,让人性发出美丽的光辉。我们不能根据多数人与禽兽的差别微乎其微,就说人性与兽性的差别微乎其微。

西方主流经济学倾向于把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设定为不变的人性或无法改变的事实。这是个不易识别的错误。如果我们认为自我利益就是个人拥有的物质财富,那么今天多数人都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这个事实,只是现代资本主义文化所形塑的事实,而不是不可改变的事实。

经过马克思和萨特等思想家理论的发展,现代哲学有一个基本共识:没有什么绝对不变的人性。存在先于本质。每个人的本质是他一生选择和创造的总和,而每个人的选择和创造又受到他所处的各种社会关系的制约。在马克思看来,人性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那么,不同时代、不同社会的人就有不同的人性。换言之,不同的文化塑造不同的人性。

古代中国人认为人之为人在于有道德,于是古人极看重道德。有德者才受敬重,才有可能成为官员。古代中国社会的领导阶级是士——以天下为己任的读书人。他们的最高理想是成为圣人,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他们所理想的文明是道德指引着政治和经济,而不像现代文明,经济决定着一切(包括政治与道德)。由他们所领导的文明,经济增长和科技进步都十分缓慢,但可持续,中华文明传承五千年就是明证。

在发展主义的影响之下,经济被认为是最重要的,政治、道德、文化都是由经济决定的,无止境地追求物质财富的增长被认为是人的本性,于是,我们片面地甚至不顾一切地谋求发展。发展主义认为,只有当物质财富不断增长时人们才会生活得幸福。其实不然。人生幸福只需要足够的生活资料,不需要不断增长的物质财富。人是追求无限的有限存在者。追求无限就是追求人生意义。一个人只要坚定地认为自己所做的事情(事业)是有意义的,那么,即使他身处困境,也会觉得充实、幸福。对人生根本意义的理解是多种

多样的,物质主义只是多种理解中的一种。如果说无限追求物质财富的增长是多数人易于表现的倾向,那么这恰恰是需要通过意识形态和制度加以抑制的倾向,而绝不是值得激励的倾向。现代人无限追求物质财富的增长,恰恰因为他们认为人生意义就在于永不休止、死而后已地追求物质财富的增长,或追求物质财富的增长就是最有意义的事情(即信仰了物质主义)。中国古代的儒家、道家以及由印度传入中国的佛教都把人的这种倾向看做贪婪,看做一种危险的心态。儒家把这种倾向视作该时时加以防范的“人欲”,是对“天理”的背离。长期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把儒家“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当做反动思想大加挞伐,殊不知这一思想包含极为深刻的哲理。要求人们“存天理,灭人欲”,就是要求人们以追求道德境界的方式追求人生意义,反对以贪求物质财富的方式追求人生意义。发展主义完全反过来了,它把人的贪欲视作发展的动力,创新的源泉,激励人们以无限贪求物质财富的方式追求人生意义,把人的原本有限的物质需要无限放大了,实则是把被传统文化视为洪水猛兽的贪欲合法化、道德化、美化了。

当然,发展主义要求人们把自己的贪婪约束在彼此互不伤害的合法范围内。如果你合法地贪婪,则越贪越好。如果你越来越贪婪,且总是合法地行事,则绝不会有人指责你贪婪。相反,你会大受赞颂,人们会说你事业心强,永远进取,会称赞你是卓越的成功人士,你也最有可能成为领导者。我国近30多年的发展,就是在由容许“合法贪婪”到激励“合法贪婪”的过程中实现的。如今,合法贪婪的人们已成为中国社会的中坚力量。

汹涌激荡的人欲固然仍能推动经济的持续增长,但它能推动我们遏制社会腐败、谋求社会和谐并保护自然环境吗?

我们且不说激励贪婪的制度难以把众多人的贪婪完全约束在合法的限度内,当代中国许多贪婪的人们不仅时时钻法律的空子,而且已丧失了起码的良知,例如,为了牟利肆无忌惮地在各种食品中添加各种有毒物质。我们且假设绝大多数人是遵纪守法的贪婪的人,即永不知足地但合法地追求物质财富增长的人,那么,靠他们按既定的发展模式进一步发展就能解决问题吗?

独断理性主义者(即科技万能论者)会乐观地回答:能!他们中服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人们会说,有市场和科技这两个法宝,可轻而易举地解决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气候变化问题。在他们看来,只要给污染定个价,并制定出污染权交易的法律,就可以激励企业和个人去发明保护环境、节能减排的技术。简言之,如果整个国家乃至国际社会的各种制度,能把污染权 and 环境保护责任明晰起来,让个人和企业能以保护环境和节能减排的方式赚钱,则自然环境和生态健康就能得到卓有成效的保护。由贪欲造成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气候变化问题归根结底要靠贪欲推动人们去解决。目前的“碳交易”制度就是循此思路而制定、实施的。

我们当然不能一概否定这一办法的有效性,不能一概否定市场和科技创新的重要性。但如果认为“市场+科技”就能一举解决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那就太天真了。

按这个思路解决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至少必须从根本上改变产业结构和科技创新方向,必须彻底淘汰那些重污染、高能耗、低效益的产业,发展低排放、高效益的产业,必须放弃某些科技项目,把大量科研经费投入到环保和节能的研究和开发之中。要实现这些转变,必须促进人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念的根本转变。只有当那些长期投资旧产业的公司领导人有了环保意识和生态学观念时,他们才可能下决心根本改变其投资方向。只有当那些长期研究征服自然的科技工作者放弃了独断理性主义和科技万能论时,他们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研究方向。

发展主义所指引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为能卓有成效地保护环境、节能减排、维护生态健康,必须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发展观。如果我们不能割舍“发展”这一概念,那么我们就必须改变这一概念的内涵。迄今为止的发展主义不仅蕴含经济主义,还蕴含物质主义,即预设发展的明显标志甚至根本标志就是物质财富的增长,预设一个国家或社会的物质财富没有增长就不能被称之为发展了的国家或社会。如果我们仍然坚持这样的发展观,那就根本不可能真正有效地保护环境、节能减排。

我国政府并非最近几年才要求保护环境的,也并非没有《环境保护法》,我国自2007年中国共产党十七大召开就倡导建设生态文明。为什么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就因为人们对物质财富增长的重视远远甚于对环境保护的重视,就因为人们真心实意地谋发展,却只是装模作样或半信半疑地建设生态文明,例如,许多企业的排污设备仅在有人监督时才运行,无人监督时就不运行。

无可否认,我们目前面对的严重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是近20年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排放的后果,即片面发展的后果。但坚信发展主义的人们决不肯放弃大量生产、大量消费的生产生活方式。在他们看来,有了市场经济和绿色科技创新,我们就可以一如既往地大量生产、大量消费,绿色科技创新将能保证节能减排,从而不会再有大量排放,将来甚至能实现零排放。所以,有了市场经济和绿色科技创新,我们就可以一边拥有越来越多的汽车、空调、电视、电脑、手机,一边享有蓝天白云和青山绿水。于是,我们一边全力扩大物质生产和物质消费,一边忙于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但扩大物质生产和消费的一手,远比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的一手硬,即发展的一手,远比保护环境的一手硬,建设物质文明的一手,远比建设生态文明的一手硬。于是,我们迎来了2013年初以来的全国性雾霾天气。这就是片面发展的代价。

发展主义者似乎认为,发展意味着改善,一个国家得到了发展就意味着这个国家人民的生活得到了改善,所谓生活改善,即生活得越来越好。如今我们已清楚地看出,并非人均收入高了,物质财富增长了,科技进步了,人们的生活就得到全面改善了。如果人与人之间关系日趋紧张,连食品都不安全,连清洁空气和清洁水都没有,那么即便腰包鼓胀,有汽车、别墅,也不可能生活幸福。社会的全面改善必须包括人的基本素质的提高、人际关系的改善、公共道德水平的提高、民主法制的健全和自然生态状况的改善,仅有物质

财富增长决不意味着社会的改善。

从生态学的角度看,物质财富的增长是有极限的,我国的物质生产和消费显然已达生态系统的承载极限。如果我们仍不顾一切地谋求物质财富的增长,全国雾霾、水污染、重金属污染等非但不能减轻,而且会加重,我们就可能陷入万劫不复的巨大灾难。至此,我们如果仍不改变发展方向,就是执迷不悟的“自作孽”了。自作孽,不可活啊!

生态学或全球性的生态危机都表明,地球生态系统不支持几十亿人的贪婪追求,以物质贪婪促发展的文明是不可持续的。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不支持十几亿中国人的贪婪追求,十几亿中国人的合法贪婪极可能导致全国性的生态崩溃。如果说上个世纪的外族侵略曾把中华民族逼到了最危险的时候,那么如今中华民族的暴富则把自身逼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以全国雾霾为明显症候的严重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就是大自然向中华民族发出的警告。摒弃发展主义,扭转发展方向,建设生态文明,才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出路。

环境政治学视野下的 雾霾之困

郇庆治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十八大报告关于“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阐述,不仅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全面现代化未来蓝图的愿景描绘,更是党和政府向人民群众所作出的庄严政治承诺和面向全国各族人民的绿色政治动员。显而易见的是,无论是建设“美丽中国”还是实现绿色“中国梦”,都需要我们全民上下基于一种崭新政治认知与政治共识的切实行动。

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不应只是关涉少部分人的道德高尚举止,而且必须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政治正确与正当行为。在笔者看来,对这一点的最好注脚就是因2013年春节前后肆虐华东大部分地区的严重雾霾而迅速升温的大众“呼吸关切”。只是这种“雾霾政治学”所包含的哲理或意蕴要远远超出大多数人的理解,值得更充分的讨论。

(一)

毋庸置疑,雾霾在当今中国已远非只是由于工业生产(尤其是能源和原材料的低效利用)和居民消费(比如私家车)等造成的大气污染,即一种有害人体健康的物理与化学现象,还同时呈现为敏感的社会民生问题和发展问题。作为一种社会民生问题,频繁发生的严重污染甚至毒化的天气,已经在明显影响着相关区域特别是大中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并在更大程度上和更大范围内造成了一种公众的“呼吸关切”。网上广泛传播的各种戏说调侃,尽管有些言辞尖刻,但归根结底反映的还是人民群众对于自身环境权益的申辩和吁